学术专论

雍正朝八旗察哈尔改革及其影响

苏日朦

[摘要] 雍正时期，清朝对八旗察哈尔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规范比丁制度、清查人口、调整佐领等措施。本文基于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并结合相关多语种史料，围绕雍正时期八旗察哈尔的改革，重点探析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清朝规范八旗察哈尔比丁的措施；第二，分析雍正朝八旗察哈尔的人口构成，揭示其多元部族结构形成的过程；第三，考证雍正十年增编及调整八旗察哈尔佐领结构等问题。

[关键词] 边疆民族 治理 雍正朝 八旗察哈尔 改革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5－0064－10

康雍乾三朝是八旗察哈尔多元部族结构形成的关键阶段。康熙年间，在蒙古卫拉特部与喀尔喀部的冲突中，喀尔喀、巴尔虎等部族的大量人众迁至漠南蒙古地区，清朝将其中一部分安置于八旗察哈尔游牧地。此外，卫拉特蒙古及漠南蒙古茂明安、苏尼特等内扎萨克旗的部分人众也有编入八旗察哈尔者。雍正年间，清朝调整了八旗察哈尔佐领结构，并规范了八旗察哈尔比丁事宜，使之进一步制度化。乾隆朝，大量投附的卫拉特贵族及其属民被清朝安置于八旗察哈尔，另外原居察哈尔游牧地的八旗蒙古喀喇沁、浩齐特等游牧佐领被正式登记造入察哈尔各旗丁册，于是在察哈尔游牧地形成了多元部族构成的八旗察哈尔群体。

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集军事、行政管理为一体的组织。清朝入关后，八旗制度不断调整、完善。尤其是雍正朝，清朝通过变革八旗领主对佐领统治权等方式，对八旗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有关雍正朝对八旗制度的改革，学界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①] 但现有的研究成果鲜少专门探讨雍正年间的八旗察哈尔改革，[②] 且以往学界也很少将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的多

[收稿日期] 2024－01－23
[作者简介] 苏日朦（1993— ），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1，surm@cass.org.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八旗察哈尔的形成与清代边疆民族多元治理政策研究”（23CZS036）阶段性成果。

① 有关雍正朝八旗制度改革的研究，国内主要有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10年)、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从清朝政治制度史角度考证了雍正皇帝如何通过八旗制度改革来强化皇权的过程。日本学界对雍正朝八旗制度改革关注较多，在佐领改革方面主要有铃木真《清朝入关后旗王对佐领支配的构造——以康熙雍正朝为中心》(《历史学研究》卷号830，2007年8月)以及细谷良夫《〈八旗通志·旗分志〉的编纂及其背景——雍正朝佐领改革之一》(《东方学》36号，1968年)等；雍正朝户籍制度改革方面主要有细谷良夫《八旗审丁户口册的成立及背景》(《东洋学集刊》第10期，1963年)等。

② 目前学界有关八旗察哈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史实梳理，如达力扎布：《清代察哈尔扎萨克旗考》，《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达力扎布：《清初满蒙文档案记载中的八旗察哈尔》，《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元治理政策与八旗察哈尔形成过程结合起来探讨，可见该问题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八旗察哈尔的研究具有其特殊性，现存史料分散，无系统完整的地方档案可利用，相关档案主要保存于清代中央政府形成的文书中，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为“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这些满文档案对阐释清朝治理八旗察哈尔十分重要，弥补了察哈尔没有地方档案可利用的局限。本文基于“一史馆”所藏满文档案，结合相关官修汉籍史料，系统梳理雍正朝针对八旗察哈尔采取的改革措施以及对稳固北部边疆起到的具体成效，同时探讨八旗察哈尔多元部族结构形成的历史脉络。

一、比丁制度的规范化与职官的增设

（一）比丁制度的规范化

户籍制度事关赋税、田亩及对人口的管理等重大事项，因此清朝入关之前，就以明朝的户籍制度为基础，在其辖区编审户口。入关后，清朝继续在中原、外藩蒙古等地区推进其编审户口的措施，并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措施，如《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八旗人丁三年编审一次，300名壮丁编为一个佐领，要求将旗内所有成丁编入丁册。①

八旗察哈尔则有其特殊性，乾隆帝派讷亲调查居八旗察哈尔游牧地之喀喇沁、浩齐特佐领多年未比丁的原因时，察哈尔总管等称：

> 察哈尔总管等所辖诸佐领，原无比丁之例。喀喇沁、浩齐特人系在京佐领所辖之人，由其各该所属蒙古旗派人检查。后因世宗宪皇帝有旨：着将察哈尔人等亦照外城（外藩蒙古）之例比丁，八旗察哈尔总管等仅将隶属察哈尔旗原未比丁人员检核比丁。此项浩齐特、喀喇沁人员，察哈尔总管等处无可查档册。伊等又非附于察哈尔佐领之人员，所属总管等处无包括伊等数目之比丁事宜。②

上引档案明确指出，雍正时期下旨规范了八旗察哈尔的比丁事宜。同时结合《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可以推断雍正朝以前清朝对八旗察哈尔的比丁并不规范。迟至雍正元年（1723），清朝才逐步规范了八旗察哈尔的比丁制度，具体如下：

> 塞外居住之八旗察哈尔蒙古护军、骁骑之器械，三年查看一次，而前往之护军参领、骁骑参领等骚扰蒙古，勒索马羊等物。其三年一往比丁之官员亦有勒索之处，朕所洞悉。再察哈尔蒙古内，未出痘者甚多，若来京挑选护军，倘遇出痘，恐有损伤。嗣后察哈尔八旗护军缺出，即着察哈尔总管、副总管、参领等，公同阅看人才，可用者挑补。其挑补之护军，俟三年查看军器时，从京中奏派大臣一员，前往查看军器，将所挑之护军一并验看。其三年比丁，亦照外省例，交与该总管等详查明白，将比丁过数造册送各该旗都统，则众蒙古无骚扰之患，亦无往返京师之事，于伊等大有裨益。着八旗蒙古都统、管侍卫内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公同议奏。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③

乾隆二十六年（1761）设立察哈尔都统之前，八旗察哈尔的事务俱由在京八旗蒙古都统负责管理。雍正元年之前，由在京八旗蒙古都统派遣护军参领以及骁骑校前往游牧地检验兵器。八旗察哈尔游牧地的兵丁，多为未出痘者，如赴京挑补八旗蒙古之缺，存在一定的隐患，故而

2008年。苏日嘎《清代大一统格局下北部边疆民族多元治理政策——以八旗察哈尔喀喇真固木佐领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利用满文佐领根源册梳理了清朝对编入八旗的察哈尔群体的多元治理政策。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3《八旗都统户口》。

② 参见《奏明先前察哈尔比丁而浩齐特喀喇沁未比丁原由片》，乾隆朝（无具体日期），《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档案号：03-0195-3529-037。本文所引满文档案的拉丁字母转写及汉译均由笔者完成。

③ 金志章纂、黄可润校补：《口北三厅志》卷首，乾隆朝刻本。

改由在京八旗蒙古都统派员一名，查验兵器以及挑选补缺之人，同时规定八旗察哈尔的比丁手续，照“外省”[①] 造比丁册送所属八旗蒙古都统之处。按照外藩扎萨克旗比丁之例，每三年进行一次，壮丁年龄 18 岁以上、60 岁以下，均要编入丁册，有疾者则需要除去，如有隐匿壮丁的情况，则会对管旗的王、贝勒等进行处罚。[②] 八旗察哈尔自此依照该律例比丁。

（二）选派理事员外郎、捕盗官

理事员外郎是八旗察哈尔的重要官职，设于雍正朝。雍正元年，清朝规定八旗察哈尔各旗设理事员外郎二人，由在京人员、游牧八旗察哈尔各选任一人，审理旗务。由在京人员选任的员外郎，具体从蒙古八旗护军校、骁骑校、中书、护军内遴选精通满文、蒙古文者咨送吏部补授。由游牧察哈尔地方选任的员外郎，则由察哈尔总管从各旗散秩官员、护军校、骁骑校内选精干得体者，保送二人，拟定正陪，送院引见后授官。[③]

雍正五年针对八旗察哈尔二名员外郎进行了调整。清朝所置二名员外郎，其中一名由游牧八旗察哈尔就地选任的制度设计初衷为，“用本处之人知蒙古情形，与事必有裨益”，但事实上并未到达预期的效果，“今看来甚属无益”，故于雍正五年谕令：“嗣后咨送之人若系平常者，即将内地之人简选补授。”十一年，为提升行政效率，清朝再次规范察哈尔员外郎选派制度。由在京蒙古八旗选派的一名员外郎系直接从八旗护军校、骁骑校等群体中选派，雍正十一年改为由各旗在部院衙门任职的主事、中书、笔帖式等群体中选派。[④]

总之，自雍正朝在游牧八旗察哈尔设二名员外郎后，经过数此调整，逐渐强化了对察哈尔的管理。从制度的调整过程可以发现，清朝对游牧八旗察哈尔的优待，即始终留有二名员外郎中之一缺，只有在保送之人无法胜任时，再由在京蒙古八旗中选任。

清朝定期派兵部员外郎及理藩院员外郎等监管察哈尔总管，审理民人与蒙古交涉案件，巡查官牧厂，进一步加强了对察哈尔的管理。[⑤] 如乾隆二年，清朝派兵部员外郎兆明赴察哈尔巡查游牧地，在巡查过程中发现了大量居于察哈尔游牧地的八旗蒙古喀喇沁、浩齐特等游牧佐领。兆明在任期间，清朝为解决这些游牧佐领人员的生计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⑥]

捕盗官也是八旗察哈尔一项重要官职。雍正元年，清朝照察哈尔左翼之例，[⑦] 于察哈尔右翼设捕盗官，给予六品顶戴，食半俸。根据后期乾隆朝相关档案文书来看，设于八旗察哈尔的捕盗官也有八旗蒙古之喀喇沁、浩齐特等游牧佐领人员来充任的现象，如乾隆二年有察哈尔之喀齐尔、绥克等处的喀喇沁游牧佐领人员担任捕盗披甲。[⑧] 此外，清朝于雍正七年规定每年由部院司官或御史中派一人前往巡查游牧地各项事宜，以加强对察哈尔地区的社会管理。[⑨]

综上所述，在雍正朝之前，清朝对八旗察哈尔的管理存在松散的一面，因此需规范八旗察哈尔比丁制度，以掌握八旗察哈尔兵丁数额。同时，雍正初年，先后选派员外郎等职官进一步

---

① 汉文史料中的“外省”直译了满文的“tulergi golo”，“外藩”之意，即外藩扎萨克旗。

② 赵云田点校：《内务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80 页。

③ 赵云田点校：《内务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20 页。

④ 赵云田点校：《内务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21 页。

⑤《兵部员外郎六格参奏察哈尔总管广西法令不严失察旗员与民人合种地亩》，雍正十年十月初二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27-101；《兵部员外郎六格奏闻各部递送军营文件使用台站马匹应爱惜省用折》，雍正十年十月初二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2-0729-015。

⑥《巡查牧场等处兵部员外郎兆明奏闻察哈尔地方无业浩齐特喀喇沁人数并请交部料理折》，乾隆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52-001。

⑦ 八旗察哈尔分左右二翼，左翼分别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右翼分别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清廷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在察哈尔左翼设立捕盗官，六品顶戴，食半俸。参见赵云田点校：《内务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8、20 页。

⑧《兆明奏察哈尔地方无业喀喇沁浩齐特人数并请交部料理折》，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0173-1052-001。

⑨ 赵云田点校：《内务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21 页。

强化对八旗察哈尔的管理。可见，从雍正朝开始，无论是八旗察哈尔的职官选派，还是人丁管理等方面均开始趋于规范化、制度化，这是清朝对察哈尔的统治趋向成熟的表现，也体现了清朝的北部边疆民族治理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

二、清查丁口与强化管理

自雍正元年规范八旗察哈尔比丁制度后，清朝对察哈尔人丁情况有了初步的掌握。其后于雍正九年十月十六日，清朝遣人调查为其看守牧群的蒙古人的生计情况，重点查看游牧地蒙古人是否有赖以谋生的产业，如牲畜或田产等。雍正九年，八旗察哈尔生计情况如下：

> 雍正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圣旨：八旗察哈尔等俱系累世为国家效力之旧人。从前征讨南方（按：三藩之乱），剿灭噶尔丹，并随围出猎，以及数年用兵于准噶尔，宣力之处不胜枚举。此次达锡率领察哈尔兵一千，较众先到军营。又击败准噶尔贼人策凌敦多布，夺回驼马等物，甚属可嘉。又额鲁特大臣来京之际，被问及旧察哈尔人生计，反不如新附额鲁特，等语。朕闻之恻悯，以至落泪。今边外糊口之蒙古人中有王、大臣之牧场之蒙古人中亦均有伊等无法养赡者。王公大臣之包衣人亦为国家之真正旧仆，其生计艰辛，朕于心不忍。今派专员查使之俱获生计，尔等为我累世效力之旧人，朕务必赏赐伊等，使其获谋生之道。钦此。①

康熙朝，八旗察哈尔官兵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及征战准噶尔时立下了汗马功劳。雍正朝，察哈尔官兵同样得到清朝的重视，被频繁调遣出征，屡获清朝嘉奖。但在新归附清朝的额鲁特贵族进京之际，清朝皇帝问及察哈尔人的生计状况时，获知作为“为国家效力之旧仆”的察哈尔人反而不如新编入八旗察哈尔之额鲁特佐领富裕，且八旗察哈尔游牧地居有大量隶属王公宗室牧群之包衣人，同察哈尔旗官兵一样，被清朝统治者视为“世代为国家效力之旧仆”。

针对上述情况，雍正十年四月清朝对八旗察哈尔官员的俸饷制度进行了改革：

> 察哈尔人等居住近边，理应与内地之人一体效力行走。从前定制，察哈尔处官员内，有职掌者，给半俸；无职掌者，给俸四分之一。伊等俱系国家效力之人，今特沛恩膏，有职任官员，给全俸；无职任官员，给与半俸。②

清朝尝试通过提高俸禄待遇来改善察哈尔官员的生计，而同样居察哈尔游牧地兵丁的生计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清朝决定派专员调查八旗察哈尔官兵生计情况。③ 雍正十年五月十六日，清朝派散秩大臣色楞亲赴八旗察哈尔游牧地调查察哈尔各旗无业户，其调查后的奏文如下：

> 雍正九年十月二八日……臣我等至察哈尔，会同诸总管核查得：八旗察哈尔无马匹牲畜、田产等人户有一千九百九十四,五千二百一十五人；商都达布逊诺尔等牧场一千九百二十二户，六千八百四十五口；王公大臣、官员所进之人五百户，一千六百七十口中可披甲者三百八十八。自喀尔喀、内扎萨克旗等处居察哈尔糊口之三百一十户，一千二百零四口中可披甲者一百八十六。以上四千七百二十六户，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四口。故臣我等所查八旗无业蒙古人之总数另缮入一折，呈奏御览之四十七本清册咨呈理藩院之外，为此恭谨奏闻。④

以上为散秩大臣色楞亲赴察哈尔清点的无业户数额，共4726户，14934口，其中宗室王公

---

① 《为旧察哈尔生计艰难命大臣前往查勘令伊等各得养赡事》，雍正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18-009-000001-0003。

② 《为察哈尔系效力国家之旧仆特施恩在任官员给食全俸闲散官员给食半俸事》，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18-009-000002-0001。

③ 《为旧察哈尔生计艰难命大臣前往查勘令伊等各得养赡事》，雍正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18-009-000001-0003。

④ 《查奏察哈尔地方贫困蒙古数目以备接济折》，雍正十年五月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30-001。

及官员所进贡之牧群蒙古人中可披甲者有 388 人，内扎萨克、喀尔喀等处居察哈尔游牧地糊口者中可披甲者有 186 人。奏折中所提到的察哈尔无业蒙古人的清册有幸以附件形式保留在录副档案内，[①] 通过这些户口清册可以精准地掌握雍正时期八旗察哈尔的人丁构成及分布（见表 1）。

表 1　进贡人、居察哈尔糊口之户口册

旗分 / 牧厂	进贡之人（户 / 口）	可披甲者（人）	居察哈尔糊口人（户 / 口）	可披甲者（人）	备注
镶黄旗	28/138	24	120/437	52	官员所进
正黄旗	148/622	111	54/214	44	官员所进
正白旗	无	无	5/27	4	/
正红旗	119/405	111	无	无	宗室、官员所进
镶白旗	4/8	无	15/31	8	官员所进
镶红旗	5/18	4	无	无	官员所进
正蓝旗	6/41	7	26/136	14	宗室所进
镶蓝旗	190/438	131	20/61	16	王公所进
三旗牛羊群	无	无	68/289	48	/
左翼太仆寺牧厂	无	无	2/9	无	/
总计	810 户、2874 口、可披甲者 568 人				

资料来源：《进贡人居察哈尔糊口之户口清册》，雍正十年五月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30-001。

表 1 反映的是八旗察哈尔及官牧厂中由宗室王公、官员所进贡之人，虽寄居察哈尔，但严格意义上并不隶属于八旗察哈尔。所谓的“居察哈尔糊口人”，根据奏文主要源自内扎萨克旗以及喀尔喀。

察哈尔八个旗分及察哈尔游牧地的清朝官牧厂与内务府所属牛羊群中也有大量的无业户，八个旗分共有无业户 1994 户，计 5215 口；商都达布逊淖尔、达里冈崖马厂、太仆寺左右两翼牧厂、三旗牛羊群共有无业户 1929 户，计 6845 口。[②] 此次清查八旗察哈尔无业户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首先，这一时期是清朝经略准噶尔、稳定西北边疆局势的关键阶段，在平定罗布藏丹津之乱后，清朝仍面临来自准噶尔噶尔丹策凌的威胁。尤其是在雍正九年六月，清准在和通淖尔大战，结果清军大败，损失惨重。噶尔丹策凌趁此机会攻入喀尔喀，一边发动军事进攻，一边煽动喀尔喀王公贵族反清。[③] 八旗察哈尔游牧地毗邻漠北喀尔喀，又值用兵之际，清朝此举无疑是为了扩充兵丁稳固边防，同时以备随时抽调出征，故而命令所属王公、官员等将其无法赡养的居察哈尔游牧地的无业蒙古人数报出。其次，为了避免口外无业蒙古人因生计问题影响区域社会秩序，进而牵连其所属王公、官员。

雍正朝八旗察哈尔的人口构成及分布，均十分复杂，除了察哈尔各旗之外，还有商都达布逊淖尔、达里冈崖牧厂、太仆寺左右翼牧厂等官牧厂及内务府所属三旗牛羊群等无业人户，以及居游牧地糊口的人丁、进贡之人等。其中居察哈尔旗糊口的人以及进贡之人多为八旗王公、官员无力赡养的人。大量的内扎萨克旗及喀尔喀人居察哈尔游牧地糊口谋生。

在游牧地还有大量民人从事农耕以谋生，与八旗察哈尔蒙古人混居一地，清朝曾在雍正二年于张家口专设“张家口理事同知”来审理蒙古与民人之间的各类案件，这也充分体现了居于八旗察哈尔游牧地各民族的交流与互动日益密切。[④]“厅”作为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治理模式，

---

① 色楞呈给理藩院的 47 本清册内容应更为详细，但笔者目前尚未发现该 47 本清册相关的信息。

② 《八旗察哈尔无业户清册》《商都达布逊淖尔等地牧场无业户人口清册》，雍正十年五月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30-001。

③ 乌云毕力格、成崇德、张永江：《蒙古民族通史》第 4 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88-189 页。

④ 金志章纂、黄可润校补：《口北三厅志》卷 4《职官》。

主要体现在其设立多为临时性，是一种过渡式的行政建置。“厅”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边疆地区各族间的交流与互动，展现了察哈尔游牧地南部区域逐渐呈现的农牧交错、多民族共生的历史景象。

清朝在本次清查户口的基础上，对八旗察哈尔实施了诸多调整改革措施，以下将以雍正十年调整八旗察哈尔佐领为例，分析八旗察哈尔多元部族结构形成过程中的具体史实。

三、八旗察哈尔佐领结构的调整

从雍正九年在清查察哈尔无业户过程中得知其人口构成复杂且数量庞大之后，清朝派遣散秩大臣色楞清点，同时命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商议如何解决八旗察哈尔的生计问题，鄂尔泰等人商定如下：

> 先前之旨，派散秩大臣色楞等至口外令其查糊口之蒙古人，又王公大臣、官员、闲散人等之居口外无法养赡之人，以致妄生事端，则伊等家主无辜受累，情愿报出，谨遵。臣等商议宗人府、八旗查送七百余口，交付散秩大臣色楞等详查此等蒙古人及糊口之蒙古人内可披甲者之数，其生计之源等。今色楞等查得，八旗王大臣官员等所进蒙古及移居就食蒙古人，总计八百余户。于其内选得谙骑箭，堪以充兵之壮丁五百七十余名。八旗察哈尔之事务实属紧要，若兵丁居多，则易于调遣，此等所挑之丁每佐领编入五十名，总计编设十一佐领，充分护军、领催、披甲，着钱粮，令操练骑射鸟枪等项。其制备军器、马匹、银两，照例给与。将其各自之子弟附于一佐领，闲暇之时教其射箭，出缺后，以备挑选。其中正黄旗之侍卫阿拉布坦所进蒙古人，俱为其父乌拉特台吉松迪自愿携奴仆属众，入旗效力。自故地所携之人已足一佐领。该佐领员缺，请于伊子弟内补授，编为世管佐领。其余各佐领，俱系凑集各处蒙古所编，应编为公中佐领。于察哈尔闲散官员、荫生、护军校、骁骑校等内择奋勉之人，引见后补放。若无奋勉之人，则择掌管优长者，暂为署理。待出征人员返回时，择奋勉之人再行补放。护军校、骁骑校之缺，亦照例从察哈尔之先锋、护军等中选挑。[①]

可知，清廷对散秩大臣色楞所呈八旗察哈尔无业人口档册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对无业人员数量庞大局面的应对措施。

首先，从八旗察哈尔及进贡之人、居察哈尔糊口者中挑选壮丁，编设佐领，让这些无业人获得官差以及领取钱粮的机会。对编入佐领的壮丁子弟亦进行教习，以备出缺时及时挑补。对从乌拉特旗携众而来的阿拉布坦及其属民，[②] 色楞提议编为世管佐领，隶正黄旗。乌拉特旗作为外藩扎萨克旗，阿拉布坦所属民众在原旗应为箭丁，扎萨克旗箭丁一般不会从国家获得钱粮，这一点与八旗体制下的兵丁待遇不同。而被编入八旗后，就须承担兵役，同时领取钱粮，从而获得经济保障。这也是原隶属于扎萨克旗的蒙古贵族自愿携众被编入八旗察哈尔的主要原因。结合《大清会典事例》所载，一般此类有“根源”的贵族携众而来均被编为具有世袭性质的佐领。王公、官员等无法赡养的这类人均与其具有私人隶属关系。这些无业户被编入八旗体制，其旧有的“主从”隶属关系就会被解除，进而被造入佐领丁册，通过披甲等方式获得钱粮，一般这类人会编设为公中佐领。

其次，鄂尔泰等人认为增加八旗察哈尔兵丁数额，易于清朝抽调派遣。自和通淖尔之战后，准噶尔策凌敦多布率军攻入喀尔喀，由额驸策凌率领的喀尔喀军队与清军配合，抵抗准噶尔的

---

① 《查奏察哈尔地方贫困蒙古数目以备接济折》，雍正十年五月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30-001。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977《理藩院》亦记载乌拉特阿尔布坦率众来归，编为世管佐领，隶于正黄旗。

攻击。察哈尔游牧地毗邻漠北喀尔喀，增编佐领和扩充兵丁可视为清朝对八旗察哈尔军事力量的有效利用，同时对稳定北部边疆局势的作用不言而喻。

针对察哈尔各旗佐领数目不均衡的情况，鄂尔泰等提出：察哈尔八旗佐领数多少不一，上三旗佐领多，下五旗佐领少，故该新编十一佐领内，阿拉布坦之佐领照旧隶于正黄旗，其余十佐领，于下五旗下每旗各编设二佐领。八旗厄鲁特佐领部分旗多、部分旗少，不均，故亦令平均。针对色楞等人调查的清册，鄂尔泰等人认为应当挑选一部分人为护军、披甲，给予钱粮，其余闲散人丁照厄鲁特佐领闲散照例每月着钱粮。[①] 雍正十年以前察哈尔各旗佐领情况：镶黄旗19个、正黄旗15个、正白旗17个、镶白旗8个、正红旗10个、镶红旗11个、正蓝旗10个、镶蓝旗11个，八旗共计101个。[②]

雍正帝在其执政初期对八旗制度权力构造的一项重要改革就是通过削弱宗室对佐领的统治权，将皇权扩大至宗室王公属下非皇帝所领之下五旗的旗人，其中一项就是调整佐领结构，对佐领进行“均齐化”，调整上三旗与下五旗佐领比例。[③] 如雍正八年，鉴于八旗汉军上三旗与下五旗佐领比例悬殊的情况，清朝通过以下措施对佐领进行了“均齐化”调整：均齐上三旗各旗佐领数额；增设下五旗每旗佐领；将上三旗所余佐领酌量拨入下五旗；增添领催、步兵领催、步兵；补足枪手、敖尔布、教养兵等。[④]

由上文可知，察哈尔上三旗与下五旗佐领的确存在比重悬殊的现象，且尤以镶黄、正黄二旗的世袭佐领居多，因此清廷主张在八旗察哈尔也进行佐领“均齐化”调整。

另外，针对察哈尔无业贫困人员，鄂尔泰等提出：

> 伊等俱为无业贫困人，唯靠牲畜居蒙古游牧地，故赏赐每户置业母牛两头，母羊十只。总需母牛一千六百二十头，羊八千一百，由总管博忽礼所辖牛羊群中取给。挑入兵丁之人，若无马匹则不可，故每人赏给骟马一匹，骡马、马驹各一匹。该所赏之五百五十匹马，照官价每匹八两银子，携马驹之骡马每匹亦八两银子，折为银子赏给伊等，令其自行购置，由所派官员赏给，总需银共八千八百两……色楞等人所查贫困兵丁中，每户赏给十两银子，每口赏给布两匹。牧厂人，不可相较于效力于军中之人，故每口赏给布各两匹。总需银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两银，两万四千一百二十布匹，由驿站车送至张家口外，由所赴大臣等会同总管等赏给。[⑤]

旗人生计一直是清朝统治者重视的问题。自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帝，为抚恤八旗兵丁、解决其生计问题，均采取了诸多措施，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增加兵丁粮饷额度；编设新的佐领；代还旧债，赏赐银两、布匹等；增加兵丁名额；赎回民典旗地，或分于旗人，或贱卖给旗人；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等等。[⑥]

八旗察哈尔也同样存在生计困难的现象，对此鄂尔泰等人建议通过赏赐银两、牲畜以及布匹等方式改善其生计情况。因八旗察哈尔居游牧地，除获赐的财物与八旗兵丁待遇相同之外，也因获得清朝赏赐的牲畜等而颇具游牧生产方式的特色。因救济对象身份不同，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同，效力于军中之兵丁所获钱粮则多于在牧厂任差的人员，这也反映了正值用兵之际，清朝十分重视官兵的生计问题。

最后，鄂尔泰等人求旨将所查之蒙古人编设为佐领，给官员、兵丁等置办产业。因涉及平

---

① 《查奏察哈尔地方贫困蒙古数目以备接济折》，雍正十年五月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30-001。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77《理藩院》。按，为便于计算将半分佐领一同计入。

③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308-309页；细谷良夫：《雍正朝汉军旗属牛录的均齐化》，冬哥、大鹏译，《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④ 《清世宗实录》卷99，雍正八年十月甲辰。

⑤ 《查奏察哈尔地方贫困蒙古数目以备接济折》，雍正十年五月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30-001。

⑥ 周远廉：《八旗制度和“八旗生计”》，《第三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7-85页。

均额鲁特佐领、赏赐察哈尔贫困人等事情，故而建议派散秩大臣色楞等会同所属总管一同核查办理。[1] 雍正帝允准了鄂尔泰等人的建议。

同年六月初六日，领侍卫内大臣拉锡等奏请将八旗察哈尔的巴尔虎孳生人丁共2000余人，酌情增编为19个佐领，并增添八旗兵丁，其奏文如下：

> 领侍卫内大臣拉锡等谨奏：为请旨事。臣我等赴口外察哈尔八旗哈柳图河之处，会同诸总管核查，左右二翼每翼佐领之数，每旗佐领之数，每佐领兵丁之数，总兵丁之数，军中效力者之数，现备用兵丁之数。详尽查得兵丁数目，共八十一佐领，每旗佐领，十五佐领以上、七佐领以上不等，每佐领兵丁五十名，八十一佐领中，兵丁总计四千余，含填缺之一千兵丁，总计五千余兵丁。其中，阿尔泰军台两千，伯克尔四百，巴里坤一百，总计挑出二千五百兵丁。今若调派预备二千兵丁，八旗止余五百名，即看守游牧，亦不敷用。臣我等谨思，今用兵之际，居北界之八旗察哈尔极为重要，若有调遣之事，立即派用，对军务大有裨益。[2]

阿尔泰军台在察哈尔旗境内有若干处驿站，除去阿尔泰军台、巴里坤等地出征以及预备调遣之兵丁之外，八旗察哈尔内所剩兵丁甚少。八旗察哈尔游牧地靠北部边疆，而当时八旗察哈尔所剩兵力则完全不足以看守游牧地，防御准噶尔。因此拉锡等请求于八旗察哈尔内编增佐领，扩充兵丁，以供差使。

以往学界探讨八旗察哈尔佐领、丁口等问题时，均以《大清会典事例》为主要史料。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77《理藩院》“察哈尔设官”中记载了八旗察哈尔佐领的构成、调整的过程。然而在上引满文奏折中记载，领侍卫内大臣拉锡等人结合散秩大臣色楞所呈察哈尔无业户清册，调查到八旗察哈尔共有81个佐领，这与上文根据《大清会典事例》统计的101个佐领有出入。从文书性质及成书年代而言，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是按照《大清会典》纲目，依年系事，并历经多次修改增补成书；而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作为当时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记录，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同时期的史实。

清廷收到其奏文之后，交军机大臣等商讨增设佐领等事宜。同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大学士鄂尔泰等商议之后，上奏雍正帝：

> 臣我等议得，依次编设厄鲁特十九佐领，平均每旗编设二三佐领之外，将八旗察哈尔、巴尔虎之滋生人丁编入所属旗内。唯正白旗之喀尔喀佐领移入镶白旗，正黄旗一察哈尔佐领移入正红旗。又，阿鲁科尔沁台吉衮塔尔因获罪，挑选其附于正蓝旗之二百余人丁，编为一佐领，即刻隶入正蓝旗。又，色楞等人所查之牧厂之人、觅食人丁、后投附之人加之进贡之人，总计七百余人，每七十人，编为八个佐领附于左翼，编设一百佐领，每翼五十佐领、每旗二三佐领，则可极为平均。臣我等愚见，十九厄鲁特佐领，圣主慈悲，将增设的十九佐领以翼为单位越旗移出，恐其兄弟族人等散失等语，故臣等考虑伊等之生计，以不至潦倒。查得先前察哈尔每旗增编二三佐领，平均察哈尔、巴尔虎、喀尔喀以及阿鲁科尔沁等佐领，将王公大臣等无法赡养之牧厂之人、觅食人丁等合编为佐领，共成一百佐领，每翼各派五十佐领，每旗增编二三佐领，以不至潦倒。钦此，依拉锡等人所奏。降旨后，交付拉锡等人。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十年六月初八日。奉旨：依议。钦此。[3]

结合以上两份奏文，可获知佐领调整的重要信息。雍正帝接受拉锡等人的建议，对察哈尔佐领结构进行了如下调整。一是增编佐领，乌拉特旗阿拉布坦及其属民被编为世袭佐领，

---

① 《查奏察哈尔地方贫困蒙古数目以备接济折》，雍正十年五月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30-001。

② 《奏察哈尔巴尔虎等孳生人丁共二千余人请酌情增十九佐领折》，雍正十年六月初二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1-0166-005。

③ 《奏准领侍卫内大臣拉锡所请整编察哈尔八旗佐领事折》，雍正十年六月初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26-006。

隶正黄旗；编设八旗察哈尔境内的牧厂人员、居察哈尔觅食糊口之人丁、新归附清朝的额鲁特人、进贡之人等各色人员为 19 个佐领；阿鲁科尔沁台吉衮塔尔及其属众编为一佐领，隶正蓝旗。二是均齐化调整，将正白旗之喀尔喀佐领移入镶白旗、正黄旗之察哈尔佐领移入正红旗。

察哈尔和巴尔虎人是此次增设佐领的主要部族来源。巴尔虎原属喀尔喀车臣汗部，康熙二十七年准噶尔入侵喀尔喀导致其部众分崩离析，其中有一部分迁至黑龙江，一部分则被安置于察哈尔游牧地。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清廷开始筹划从喀尔喀调拨巴尔虎人至呼伦贝尔并编设佐领。① 以上均系清朝经略北部边疆措施中的重要部分。

雍正十年六月，清朝在八旗察哈尔大规模增编佐领、扩充兵丁之后，同年八月，清朝北路副将军王丹津多尔济、额驸策凌等奉靖边大将军锡保的调委，统领二万余兵，追击准噶尔兵至喀尔喀额尔德尼召附近，于八月初五日，双方在额尔德尼召激战，清军击退准噶尔兵。准噶尔人自鄂尔浑河源遁走推河（今蒙古国境内巴彦洪戈尔省图音河）。八月二十八日，清朝挑选满洲、察哈尔精兵二千名，以堵截准噶尔兵。② 经额尔德尼召一战，准噶尔无力与清朝抗衡，更无侵扰喀尔喀的实力，于是在次年主动提出与清朝议和。

在八旗察哈尔历史上有三次规模较大的佐领调整，分别是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雍正十年、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该三次佐领增设的历史背景，无一例外均与清准关系变化具有密切关系，卫拉特蒙古在增编佐领中占多数，这也使卫拉特成为除察哈尔佐领以外，八旗察哈尔内数额最多的佐领。随着乾隆年间清朝平定准噶尔，八旗察哈尔佐领数逐渐趋于固定化。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整合，八旗察哈尔虽冠有“察哈尔”之名，但其内部已汇聚察哈尔、喀喇沁、浩齐特、伊苏特、扎鲁特、茂明安、科尔沁、扎赉特、苏尼特、乌拉特、喀尔喀、巴尔虎、额鲁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等诸蒙古部族为一体，体现了清代北部边疆地区不同蒙古部族间汇聚融合的历史过程。

四、结语

清初管理八旗察哈尔的各项规章制度尚未成熟，在职官、比丁等制度规范方面尤为明显。到雍正朝，清朝通过对八旗察哈尔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加强对边疆地区治理的同时也强化了中央集权机制。从多语种档案及官修典籍中可清晰地看到清朝对八旗察哈尔的各项制度从建立到完善的历史脉络，即逐渐趋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八旗察哈尔人丁结构十分复杂，除去八旗察哈尔官兵、官牧厂官员牧丁之外，还有大量外藩扎萨克旗进贡人员以及寄居察哈尔糊口人员，其中无业者、生计贫困者数量庞大。雍正朝鉴于八旗察哈尔出征兵丁之外，居守游牧地之兵丁较少之局面，通过改革八旗察哈尔官兵的俸饷制度、改善对居察哈尔游牧地无业户的救济制度，以及扩充兵丁、调整佐领结构等方式对八旗察哈尔采取了诸多改革措施。来自准噶尔部的威胁以及漠北喀尔喀的动荡局势也成为雍正朝对八旗察哈尔增编佐领、扩充兵丁以增强军事力量的重要原因。历经雍正朝系列改革，为后续乾隆朝设立察哈尔都统，八旗察哈尔脱离在京八旗蒙古都统管辖，逐渐向驻防八旗管理体制转型奠定了基础。总而言之，雍正朝对八旗察哈尔的各项改革措施不仅促进了其多元部族结构的形成，同时对稳固北部边疆局势与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① 柳泽明：《关于呼伦贝尔八旗的设立》，《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591 页。

② 《清世宗实录》卷 123，雍正十年九月乙未。

References

Du Jiaji. *Baqi yu Qingchao zhengzhi lungao* (Eight Banners and political research of the Qing Dynasty) . Beijing: Remin chubanshe, 2018.

Hosoya Yoshio.“Yongzheng chao hanjunqishu niulu de junqihua” (Studies on the equalization of the Eight Banners of Han’s niru during the Yongzheng period)Dongge Dapeng translated, *Shehui kexue zhanxian* (Social Science Front) 2 (1986).

Oyunbilig, Cheng Chongde, Zhang Yongjiang. *Mongogu minzu tongshi* (General history of Mongolian ethnic group). Hohhot: Neimenggu daxue chubanshe, 2007.

Yanagisawa Akira. “Guanyu Hulunbeier baqi de sheli”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ight Banners of Hulunbuir), *Qingzhu Wang zhonghan xiansheng bahsi shouchen xueshu lunwenji* (Collected academic papers to celebrating). Shenyang: Liaoning daxue chubanshe, 1993.

Zhou Yuanlian. “Baqi Zhidu he baqi shengji”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and the livelihood of the Eight Banners), *Disanjie guoji manxue yantaohui lunwenji*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nchu studies symposium).Beijing: Minzu chubanshe, 2002.

The Reform of the Eight Banners of Chahar during the Yongzheng Period and Its Influence

Su Rimeng（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ermoon0625@163.com）

Abstract: The main stag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multi−element tribal structure of Eight Banners of Chahar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the periods of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During the Yongzheng period, the Qing Dynasty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forms on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including standardizing the system of counting adult male of Chahar , checking the population,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of niru and other measures. This paper mainly makes use of the Manchu archives combined with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around the reform of the Eight Banners of Chahar during the Yongzheng Period: First,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Qing Dynasty to regulate system of counting adult male in the Eight Banners of Chahar; Second, by the records of archiv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opulation composition of Chahar, the Eight Banners of the Yongzheng Dynasty, and reveals its complex formation process; Third,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issues such as the supplement and adjustment of niru in the Eight Banners of Chahar during the 10th year of Yongzheng’s reign.

Keywords: frontier peoples, governance, Yongzheng period, the Eight Banners of Chahar, reform